

历代 谋士传

晁中辰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曾说，中华民族“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优秀，不仅仅在于她勤劳、勇敢，而且在于她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历代谋士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这里所说的谋士，不是指会耍点小聪明的人，而是指为上司出谋划策、能谋善断、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谋略家。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历代谋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书中所述事迹都有史实根据，没有无中生有的编造。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一改学术论文式的写作形式，力求通俗易懂，行文生动形象，不大段引用艰涩的古文，而在使用时译为白话。书中尽可能少加注释或不加注释，对所据主要文献在文后一并列出。

每篇都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事迹为纬，既简要交待出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又尽量突出谋士个人的活动。尤其是对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主要谋略多着笔墨，力求写出其谋略的主要影响和特征。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谋略比知识显得更重要。谋略和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了解，谋略则是对尚未发生的事件的预测和判断；讲知识是为了求知，讲谋略是为了致用。谋略是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但又不完全受知识的制约，而更主要的是谋士个人的敏锐和随机应变。从书中可以看出，有的谋士并不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却往往能料事如神，出奇制胜。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谋略，视谋略为国家兴亡、事业成败的关键。《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的军事教科书。书中提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里所说的“上兵伐谋”，就是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也”。中国还流行着一句俗语：“狭路相逢勇者胜，势均力敌谋者成。”这都强调了谋略的重要。

谋略与通常的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道德观念温情脉脉，而谋略则显得严酷和冷峻。这是因为，谋略面对的是敌对营垒，而不是亲朋好友，所以总是“策划于密室”，唯恐让外人知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阴谋”。泄谋历来为兵家之大忌。但是，这里所说的谋略，要比一般阴险小人的阴谋诡计高明和博大，而且面对的主要是敌对营垒，故能为大家所接受和欣赏，视之为致胜的必要手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发达的谋略文化。它是中国大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蕴含十分深厚。看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舞台就不难发现，活跃于舞台上的主要就是一些谋士。他们四处游说，兜售自己富国强兵、克敌制胜的谋略，希求一用。当他们不能被任用时，就显得凄凄惶惶，就苦恼，就“孤愤”。中国的谋略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而强调的是人事，是“治国安邦平天下”，强国富民。正因如此，一些谋略家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谋士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功利性，或称之为实用性。他们设谋都是以利害为出发点，目标是夺取胜利。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天、地、人及各种事物的考察都带有功利化的色彩。二是竞争性。谋士最活跃的时期就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为了进取，为了克敌制胜，谋士的谋略就闪烁起耀眼的光彩。三是灵活性，或称之为随机性。对于谋士来说，任何理论和经验都只具有相对的、有限的意义。他们更主要的是依靠

对形势的了解和直觉，在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献计献策，以出奇制胜。四是保密性。谋士们都是密谋策划，泄密就意味着失败。

由于谋士个人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不同，其谋略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儒家以攻心为上，实际上就是将道德功利化。法家则较为严苛和冷酷，像吴起为了赢得鲁国信任而“杀妻求将”，这在儒家士人中就难以找到。道家更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魏晋时期崇尚黄老，王导和谢安都持之以静，缓和了南北士族和新旧士族之间的矛盾，使东晋政权获得百余年的安宁。信奉佛道学说的谋士不贪图禄位，像李泌、刘秉忠和明代的姚广孝，他们平时以皇帝的宾友自居，事急则前来献谋，事成则游于名山或退居寺观，官位如同虚授。纵横家的谋略则主要表现在游说和辩难上，例如张仪、苏秦即是其典型代表。

历代谋士所表现出来的谋略和智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不要说一般读书人对他们的事迹知之甚详，即使目不识丁的乡间老农，也能神采飞扬地说上几段出奇制胜的智谋。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声东击西”、“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俗语，更是妇孺皆知。

今天，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市场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越来越激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和人才的重要。历代谋士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智慧宝库，人们至今仍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我们同时希望，对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气的形成，本书能起到某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谋略可以治国安邦，但为心术不正者所利用也会祸国殃民。就谋士本人来看，也有缺点，也有失算的时候。有的谋士在功成名就之后变得昏昏然，结果自身不保，即是明证。如果一个

人过分地倚重计谋，就会变得诡诈和自私，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谋略文化像其它的古代文化一样，也存在着精华和糟粕。因此，今天我们在吸收其精华的同时，也应剔除其糟粕部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书中所选都是对历史进步或多或少有所贡献的人物，而对那些虽有计谋但属于奸邪之徒的人物则不予收录。

本书收录范围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现代人物未收。在收录时既考虑到人物的代表性，又考虑到时代性，即每一个大的朝代都有人入选。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看出，受时代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谋士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颇为出名的谋士也没有选入。有的谋士虽然很出名，但因事迹太少，难以成篇，也未入选。对于书中入选的谋士，书中的分析和评述也难保十分准确和恰当。对此，尚祈读者指正。

本书成于多人之手，虽经主编反复修订，但行文风格仍不尽一致，请读者见谅。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于宏明先生和李明功先生对本书的指导思想、撰写体例等提出过很好的意见。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与广大读者见面的。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晁中辰

1996年6月6日

目 录

半生潦倒壮心不已 兴周治齐谋略盖世	
——姜太公传	(1)
治国安邦平天下 周公胜过孔圣人	
——周公传	(17)
安齐国富国强兵 霸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传	(33)
治军有术兴吴破楚 《孙子兵法》谋略宝藏	
——孙武传	(61)
强越灭吴 功成身退	
——范蠡传	(80)
身矮谋高安齐国 除暴“二桃杀三士”	
——晏婴传	(107)
腓双膝而修兵法 助田齐终成霸业	
——孙臆传	(123)
苦读书志在有为 倡合纵六国抗秦	
——苏秦传	(140)
倡连横纵横捭阖 破合纵六国称臣	
——张仪传	(155)
固干削枝号令一统 远交近攻连灭强邻	
——范雎传	(169)

多谋善战威震七国 布衣将相治国有术

——吴起传 (183)

乘时立功 急流勇退

——乐毅传 (198)

辅佐始皇天下一统 阿顺苟合身被五刑

——李斯传 (211)

助项羽称霸天下 遭遗弃“霸王别姬”

——范增传 (239)

“约法三章”定国策 识才“月下追韩信”

——萧何传 (254)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张良传 (268)

六出奇计 匡扶汉室

——陈平传 (283)

老当益壮意为国 马革裹尸慰生平

——马援传 (304)

“吾之子房”识高远 助曹争雄多奇谋

——荀彧传 (320)

大智若愚 功高不矜

——荀攸传 (333)

论天下事鞭辟入里 定战前谋料事如神

——郭嘉传 (346)

多谋善断 攻守自如

——司马懿传 (360)

三顾茅庐传佳话 鞠躬尽瘁老臣心

——诸葛亮传	(378)
重战略大局 不玩弄小智	
——鲁肃传	(397)
博学多识“杜武库” 长于谋略灭孙吴	
——杜预传	(406)
抚绥新旧 清静为政	
——王导传	(423)
多智谋恋情山水 弈棋间破敌百万	
——谢安传	(435)
扞虱高谈天下事 威德并举世称奇	
——王猛传	(452)
敢“献纳忠说” 致“贞观之治”	
——魏征传	(471)
身居高位一身清廉 为民除害臻于太平	
——姚崇传	(507)
忧国忧民亦仕亦隐 大智大略逢凶化吉	
——李泌传	(523)
安宋室多谋敢谏 治天下力致太平	
——赵普传	(543)
性刚直犯颜直谏 退辽兵转危为安	
——寇准传	(563)
助蒙元马上夺天下 行汉法治国多智谋	
——耶律楚材传	(584)
居禅寺心怀天下 辅世祖大元一统	
——刘秉忠传	(607)

素负经世之才 助明定国安邦

——刘基传 (620)

助成祖起兵一隅 定天下常居禅寺

——姚广孝传 (639)

辅明初五帝 致天下太平

——杨士奇传 (657)

辅清初四帝 以德义安邦

——范文程传 (671)

文武兼备叱咤风云 降清灭明褒贬不一

——洪承畴传 (689)

大智大勇守新疆 志在“今亮”胜“古亮”

——左宗棠传 (721)

读书求经世致用 救国靠勇谋并施

——薛福成传 (764)

半生潦倒壮心不已 兴周治齐谋略盖世

——姜太公传

提起姜太公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歇后语有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旧时门神常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字样。不过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明人许仲琳所著的《封神演义》。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乃阐教传人，修仙得道，神通广大，奉师下山，兴周灭商，降服诸路妖魔，俨然一个通天贯地的半仙。《封神演义》毕竟是一部神魔小说，历史上的姜太公没有这样的神通，但却是一位沉稳持重、善于思考的智者。人们历来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用兵艺术称为“韬略”。其实，“韬略”本来是指古代两部重要的军事著作。“韬”是指《太公六韬》，传说为姜太公所著，其实是后人托姜太公之名写成，分文、武、龙、虎、豹、犬六韬，记录了姜太公大量的谋略言行，是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传的一部兵书。“略”是指《黄石公三略》，即汉初谋士张良受之于圯上老人的那部书，传说亦为姜太公所撰。古人造伪书多愿借名人自重，以售其说。《六韬》前面赫然写着姜太公的名字，正说明他的智谋有过人之处。汉代以后，人们常将“韬略”一词挂在嘴边，姜太公实际上也就成了谋略家的鼻祖。

一、半生潦倒，冷眼阅世情

姜太公，本名尚，字子牙，又名吕尚。他是炎帝的后裔，祖先为贵族，在尧、舜时期曾做过四岳（四方氏族部落的首领），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立下功劳，被禹封于吕（今河南南阳一带），所以此后又以封地吕为氏。投奔周文王后，人们又叫他“太公望”。因此姜太公的名字见于载籍的共有七八个，这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姜太公、姜子牙、姜尚、姜望、吕尚、吕望、吕牙、太公望等。

姜太公的身世和前半生事迹，史籍记载零散，扑朔迷离，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夏禹之时，姜太公的祖先是受封的贵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孙繁衍，一部分人仍保留了贵族的地位，更多的旁支庶出则沦为平民。姜太公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到了商朝末年，姜氏家族更加衰微，姜太公已是出身微贱的庶民。那么姜太公是哪里出生的呢？《吕氏春秋》中提到他是“东夷之士”，《史记》说他是“东海上人”。其实“东夷”、“东海”大概指的都是一个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上古这一带的居民被通称为“东夷”。另一种说法是，姜太公是河内汲人（今河南汲县一带），他早年也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带，东海是他后来隐居的地方。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究竟哪一个正确则不得而知。

从我们掌握的姜太公的生平材料看，他的前半生很不得志，生不逢时，命运乖蹇，长年为衣食而奔波，饱历世事沧桑，从事过多种职业，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应当说，这些记述大多出自战国秦汉文士说客之手，多夸诞不实之词，只能近似地看出他早年活动的轮廓。

姜太公年少时，家里很贫穷，养不活更多的人口，年龄稍

长，就不得不到别人家做了赘婿。他做过农夫，但种田的本领实在不高，打出的粮食居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他又去打鱼，结果更糟，打鱼的收获还抵偿不了鱼网的消耗。姜太公缺乏谋生的本领，家境每况愈下。久而久之，引起了妻家的反感。姜太公不是那种自甘平庸的人，但胸怀大志之人往往疏于细务。姜太公的妻家当然没有周文王那样的慧眼，他们看到这位女婿难遂人意，最后干脆就将他赶出了家门。姜太公的妻家是齐人，于是后来有人就笑话他是“齐之逐夫”、“故老妇之出夫”。姜太公流落在外，落得逍遥自在。他辗转来到了作为殷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借以观察朝野动态，以谋进身之路。但此时的姜太公两手空空，困于生计，不得不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他先是在一个叫棘津的黄河渡口（今河南延津东北）开过食摊。同时又替别人帮工干活，以补不足。后来他又到一家旅店当过迎送客人的伙计。据说此时的姜太公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拼命劳作，足见他日子过得何等艰难。为维持生计，他又往来于商朝都城朝歌贩卖货物，后来又朝朝的屠宰市肆中干起了杀牛卖肉的营生。由于不善经营，他卖的肉经常腐烂变臭。据说此时姜太公已有70岁了，习庖丁之技，鼓刀列肆，对他来说已是勉为其难了。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男人，姜太公此时仍是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家中的妻儿已多年不通音讯，故后人说他“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

尽管生活艰难，但姜太公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钻研学问。长期在中原一带活动，使他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来到朝歌后，与商朝的上层社会也有了初步的接触，遂萌生了做官的念头。在这段时间内，他与周文王有了最初的交往。据《史记》记载，姜太公满腹经纶，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曾出仕商纣王。商纣暴虐无道，耽于声色，不善用人，他失望而去。又游历于诸侯列国之间，希望能得到赏识和重用，结果仍不能如

愿。有一次他来到良国（今江苏邳县北）游说，良国的君主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职位。姜太公空负雄才而曲高和寡，最终还是被赶走了，故后人说他是“子良之逐臣”。姜太公连遭挫折，失望已极。他认识到商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上此时商与东夷间矛盾激化，姜太公身为东夷人中的一员，自然难以在商境内立足。几十年的奔波劳累，年岁已大，他只得回到他的老家东海隐居起来，静观世变。

二、渭水垂钓，终为霸王辅

周人原是活动在渭水流域的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据说其始祖是后稷，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夏商之时，周一直处于属国的地位。商代后期，周人必须定期向商朝贡。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还亲自去朝见过商王。但到了商朝末年，周人内修国政，外结诸侯，实力开始增强。至姬昌时，已经成为“西伯”，也就是成了商朝西方诸侯部落的总管。周国力的壮大，引起了商纣王的疑惧和不安。为了阻止周人的进一步发展，商纣王下令将西伯姬昌抓了起来，并投进了商都附近羑里的监狱。文王被囚期间，正值姜太公在朝歌活动。姜太公仰慕西伯之贤，他们之间有了最初的接触。这期间，姜太公收了三个学生，即散宜生、闳夭、南宫括，都是当世闻名的贤士。一次，姜太公置酒招待他们，席间喟然长叹：“西伯姬昌真是亘古无双的大贤人啊，倘有这样的大贤君临天下，岂不是我们士人的福分？今西伯无端被囚，遭此大难，我们不去营救，还有谁去营救呢？”四人遂定救狱之谋，并当即秘密至羑里拜见了周文王。姜太公深知商纣王性喜玩乐，尤好女色，便让散宜生等人千方百计觅得莘国美女，以及骏马奇物等，进献给纣王。纣王喜出望外，不仅赦免了周文王，而且还赐给弓矢斧钺，授权周文王讨伐违命

的诸侯。

姜太公归隐东海后，终日以钓鱼为事，闲适自得，实际上随时在注视着天下大势。释囚而归的文王正积极振作，内修政务，外睦邻邦，整军练兵，国势蒸蒸日上。太公对此已略有所闻，逍遥余生的初衷也渐渐动摇，遂决意出山，辅佐文王以成大业。但他又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底蕴，临行时干脆就对别人说：“我已上了年纪，不中用了，久闻文王善待老者，不如且去投奔他，聊度余生。”太公昼行夜宿，不一日来到周人管辖的地界。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急于求见文王，而是在渭水岸边寻了一块安静的地方，搭了一所简陋的茅屋，悠哉游哉地钓起鱼来。那么姜太公为什么不直接求见文王呢？况且他与文王有相知相识之谊，不愁文王不加重用。其实此时姜太公考虑得更加深远周密，他知道，要想进入周人的最高决策层，事先必须进行必要的铺垫和充分的准备。太公欲参与周政，还需面对几个不利因素。首先，姜太公身为外姓，虽受文王赏识，但周人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对他不甚知悉，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尚属未知；其次，周室勋臣戚旧如云，一旦凌驾于他们之上，会不会招致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若贸然晋见文王以求重用，会使文王左右为难，恐怕效果适得其反。考虑再三，他才决定静观周室动静，垂钓渭滨，“以渔钓奸西伯”。这期间他很可能通过散宜生等人与文王取得了秘密联系（此时散宜生、南宫适等人已归周），文王为了让姜太公名正言顺地进入周室最高决策层，也进行了周密的布置。

原来文王料理国事之余，喜欢外出打猎，以求一日之闲。每次打猎之前，他都让史官占卜，预知顺利与否，所获何物。这一天文王又要出猎，但除了文王等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出猎。照例又让史官占卜，史官会意，卜毕，出卦辞云：“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黑，所获乃霸王之辅佐。”

周人颇信鬼神之说，朝中上下对此极为重视。文王带着出猎随从，直奔渭水而去。这边姜翁正垂竿挂饵，悠然独钓，等着“来者上钩”呢。忽见远处一彪车马疾驰而来，就中一人翻身下车，走至姜太公跟前。姜太公知为文王，却不动声色，依然专注着自己的钓竿。看着姜太公专心致志的样子，文王笑问道：“看来先生很乐于钓鱼吧？”姜太公道：“君子乐于实现远大的志向，小人乐于眼前的琐事。我并不是喜欢钓鱼，而是借垂钓来寄托自己的抱负。”文王道：“奇哉此言。请先生细细道来。”姜太公答道：“钓鱼事虽琐细，其实里面也有权术。以饵钓鱼，好比以禄取人；钓线细弱而饵小，只能钓到小鱼；线密实而饵香，则能钓到中鱼；线坚粗而饵食丰厚，就能钓到大鱼。鱼吃了饵食，只能受鱼钩的摆布；人得了俸禄，只能受君王的役使。由此观之，食饵之鱼可杀而烹，食禄之士可誓死为君。只要善于用人，以一家之力，可以取一国；以一国之力，可以取天下。”一席话说得文王大喜过望，说：“怪道我先君太公曾说过：‘将来会有圣贤之人到我们周国来，帮助我们周族兴旺发达。’您就是这位圣人。我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故此后姜太公又被周人称作“太公望”，姜太公一名亦由此而来。文王高兴地请姜太公上车，载回歧都，并顺理成章地立姜太公为国师，从而开始了辅佐文王兴周灭商的大业。

三、安内攘外，谋如贯珠

姜太公归周以后，君臣开始精心策划，积蓄国力。在内政上，姜太公从增强周的国力出发，向文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有一次，文王问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要成为一统四海的王国，就必须让普通民众都富起来；要成为统治一方的霸主，就必须让有知识的人富裕安适；若只做一个苟延残喘的

小国，就让做官的人富起来；若做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那就只让国家的仓库充足即可。上面聚敛多，就意味着下面所得寡。故治国之道，在于爱民。”文王问：“如何爱民呢？”姜太公答：“重生命而少杀戮，多给予而少索取。具体地说，须使民有所务，使农不失时，慎刑罚而薄赋敛，轻徭役而惜民力。这才是统治民众的根本原则。”

在法令治国方面，姜太公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刑罚并非是用来惩罚民众的，而是为了儆一劝百，因德立威，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在兴复周室的过程中，文王充分地采用了姜太公的这些治国思想，国势很快强大起来。

正当周人悄悄壮大自己力量的时候，商朝的统治却一天天腐朽、没落。纣王只听信谗奸之言，疏远比干、微子一班忠臣；只对美女、歌舞、犬马感兴趣，而把朝政大事置于一边；只对征伐、酷刑感兴趣，而丧失了民心。姜太公根据这些动向，抓住时机，向文王提出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方针，削弱商的政治影响，扩展周室的政治号召力，向商王朝发起无形的挑战。

首先，根据当时商强周弱的形势，表面上率诸侯奉纣为共主，以麻痹商纣王的注意力。为此，在姜太公的策划下，周向商献出了洛西的土地，以示诚意，并建议纣王废除酷刑，从而赢得商朝臣民和四方诸侯的好感。这样，表面上是共尊纣王，实际上以自己的威德赢得诸侯的信赖，分化瓦解了商王朝的盟邦。虞（今山西平陆东北）、芮（今陕西潼关西北）本是商的属国，两国之间发生了领土纠纷，但两国国君并没有到他们的宗主国商去解决争端，而是慕名前来晋见周文王，求他审断。二人来到周境，所见到的都是“耕者让畔（田界），行者让路”，“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互谅互让的君子之风。二君深受感动，回国之后便议定将所争土地定为闲田，不再纷争。后来这

块地方就叫“闲原”。周文王不费唇舌，自动化解虞、芮二国矛盾的事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威望大增，自动依附的诸侯有40余国。

在致力文治的同时，姜太公还协助文王积极整军练兵，征伐周围一些不听命的邦国，以壮国威。在军事征伐的过程中，姜太公成功地扮演了军师的角色，贡献了大量的计谋。可以说，周人的每一个胜利，都凝结着姜太公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姜太公并不一味强调武力，他曾向文王提出了一套“文伐”的策略。文伐的策略共有十二条：（一）因其所喜，顺其所好，使其骄而轻敌；（二）亲其所爱之人，分其威权，分化其内部力量；（三）暗中收买其臣下，为我提供情报；（四）以珠玉美女厚赂对方，纵其淫乐，使其走上自取灭亡之途。同时表面上对其平和恭顺，以懈其戒心；（五）对下面的忠臣，可暗中设计，阻其成事，使其逐渐丧失国君的信任，然后我方再亲近他，并促其国君再起用他，则可为我所用；（六）收买其国内的人才，搞坏其盟国间的关系，以促其人才外流而敌国内侵；（七）笼络利诱其近身宠臣，纵其挥霍，造成国库空虚；（八）为其出谋划策，使其尝到甜头，则对方就会言听计从，任我摆布；（九）尽奉承之能事，使其自诩虚名而妄自尊大，疏远圣贤之士；（十）通过曲意奉承以博其信任，使其视我为知己，而在不知不觉中倾其权柄；（十一）暗中收揽其豪杰，并将我方智勇之士推荐给对方，使其周围尽为我之党徒；（十二）收买其乱臣以迷之，进献美女淫声以惑之，赠送珍宝良马以使其玩物丧志，时机一到，则可与天下诸侯共谋伐之。十二条计策，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对付商王朝的软刀子，但它与真正的利剑一样寒光逼人。这些计谋与兵圣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伐十二条的内容出自后人追记，免不了有附益的成分，但大都能与姜太公的用计史实相互印证。